

# 《钦定同文韵统》蒙古文、 满文阿礼嘎礼比较研究

正 月

**内容提要** 《钦定同文韵统》是一部多文种合璧阿礼嘎礼字书，有梵、藏、满、汉四体合璧与梵、藏、满、蒙、汉五体合璧版之区别。本文首先阐释“阿礼嘎礼”的概念和范畴，认为“阿礼嘎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在此基础上以五体合璧版《钦定同文韵统》为研究对象，阐释了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字型的来源和结构特征，并对其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键词** 《钦定同文韵统》 阿礼嘎礼 蒙古文 满文

## 一 “阿礼嘎礼”与《钦定同文韵统》编纂刊行

阿礼嘎礼，源自梵语，ali为元音，kali为辅音，《钦定同文韵统》(以下简称《同文》)<sup>1</sup>第二卷中解释：“其字母五十字内阿阿阿等十六字梵言为阿礼，华言为音韵字；嘎喀等三十四字梵言为嘎礼，华言为翻切字。”<sup>2</sup>佛教经典汉文翻译中对于梵文佛教专有名词及咒语采取了汉字对音和翻切(或反切)方法，其中音韵字为梵文之阿礼，翻切字为梵文之嘎礼。汉文阿礼嘎礼是我国佛教经典翻译中最早出现的阿礼嘎礼，其雏形见于5世纪法显译《大般尼洹经》卷五《文字品》<sup>3</sup>。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典籍汉文翻译中佛教专有名词等多采用义译方式，随着佛教教规(包括传颂不能有误差)和汉文佛教经典翻译的逐渐成熟，并经过唐玄奘等著名高僧的实践运用，唐宋时期形成了“五不翻”理论<sup>4</sup>，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对佛教专有名

\* 本文是故宫博物院2021年开放课题“故宫博物院藏蒙古文阿礼嘎礼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111038)的阶段性成果，获得了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支持。

1 本文所用的《钦定同文韵统》版本是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于1939年所收藏本的PDF版，收藏编号为mo/1803/6787。经作者比对，该PDF版与下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合刊的《同文》一致。

2 (清)允禄等监纂、章嘉胡土克图纂修(乾隆十四年)《钦定同文韵统》第二卷，上海涵芬楼影印乾隆内府刻本，第2页。本文引用的古文原文无标点符号时作者均有酌情添加。

3 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满语研究》2014年第1期，第5页。

4 (宋)周敦义《翻译名义序》，绍兴二十七年(1157)刻本。

词、术语及咒语等采取义译而应采取对音方式。《同文》之“御制序”中也强调说“咒语不翻取存印度本音”。藏文阿礼嘎礼则是初创藏文字母时便已产生，并在大量的佛典藏语翻译中得到使用和完善。众所周知，藏文传统文法文献中包含藏文阿礼嘎礼的读写规则<sup>1</sup>。这说明藏文字母与藏文阿礼嘎礼的创制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藏文阿礼嘎礼已经成为比较成熟、完善的转写系统。如同《同文》卷二“西番字母说”中所言：“今西土（作者按：指令吐蕃），僧众诵持梵语仍用天竺原规，故天竺字母已足译咒之用，至于经文则皆西番之字，其中佛号、地名来自译经者，悉用对音，故其字之音呼必照西番之例。”藏文佛教经典翻译中对于经文一般性内容和佛号、地名、咒语采取的方法是有区别的，前者用“义译”，后者则用“天竺原规”和“对音”。这里所指的“天竺原规”和“对音”便是藏文阿礼嘎礼。

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也是专指佛教典籍翻译中用于转写梵文字母和藏文字母的符号体系及其书写规则。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与汉文、藏文阿礼嘎礼一样，都是佛教典籍翻译“五不翻”理论的产物。不同的是，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多了一套转写藏文的符号体系，这一点在以往的专题研究中未曾明确提到过<sup>2</sup>。这是因为绝大部分蒙古文、满文佛教典籍来自于藏文佛典的翻译，而直接源自梵文佛典的翻译少之又少，有的也只是一些咒语的转写而已。

学术界普遍认为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如同藏文阿礼嘎礼一样，是对梵文佛教专有名词、术语及咒语书面形式的转写（transliteration）符号，而实际上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还包含了转写藏文佛教专有名词、术语及咒语的符号体系和转写规则。因此，狭义的“阿礼嘎礼”，是专指梵语的元音和辅音，而广义的“阿礼嘎礼”则包括汉文佛教典籍中使用的“音韵翻切（或反切）字”及其规则，藏文阿礼嘎礼（梵文转写符号）及其规则，蒙古文、满文、托忒蒙古文阿礼嘎礼（梵、藏文转写符号）及其规则等。汉文阿礼嘎礼一般被称为“音韵翻切（或反切）字”，如《同文》中称其为“天竺音韵翻切字”。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虽为转写系统，但在实际文献中经常看到一些拼写读音的形式掺杂于其中，这为复原其藏文、梵文书写形式带来了一些困扰。

《同文》是一部梵、藏、满、蒙、汉合璧阿礼嘎礼字书，21世纪初之前相关研究成果不多，依稀见到几篇文章和一部专著<sup>3</sup>。后来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以及《同文》相关语言文字学研究逐渐增多，有了进一

1 《那唐译师〈梵文读法〉（藏文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

2 《罗文华〈〈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第35页；王敌非《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满语研究》2011年第2期，第5页。

3 例如，胡进杉《第三辈章嘉呼图克图及其创制的满文经咒新字》，《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罗文华《乾隆时期满文阿礼嘎礼字研究——从〈同文韵统〉、〈大藏全咒〉到〈大藏经〉》，《燕京学报》2004年第十七期；乌·满达夫《阿尤什固始与阿礼嘎礼》，《蒙古语言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正月《阿礼嘎礼研究》（蒙古文版），乌兰巴托ADMON出版社，2005年。

步深入<sup>①</sup>。王敌非在其《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一文中主要从梵—满语音对音角度对满文阿礼嘎礼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满文阿礼嘎礼拼写梵语长元音、浊塞辅音和送气音的特点，他又于《满译〈般若波罗蜜多咒〉中的阿礼嘎礼》文中阐释了满文阿礼嘎礼在实际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聂鸿音在其《同文》系列三篇论文中分别讨论了汉语官话，梵、藏读音规范和官话尖团音，充分利用了梵、藏、汉语的对音语料。施向东借助梵与藏、汉，满与藏之间的对音关系阐述了当时藏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大致关系。《同文》的语言、文字学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所涵盖的某一个具体民族的语言文字，更主要是体现在其四五种文字的相互对应，它对于了解清代多语言文字背景下的同文之治及其现代价值的挖掘具有很深的学术意义。

除《同文》外，流传于世的阿礼嘎礼规范性文献还有几种，其中三、四、五体合璧的《御制阿礼嘎礼》和《御制读咒法》等均属于清朝康熙、乾隆时期奉敕编撰而成，是专门针对“大藏经”满、汉、蒙古文翻译的对音对字类多体合璧书，还附有编撰者的阐释说明。

《同文》从乾隆十二年在“经咒馆”开始编纂到三十九年刊行五体合璧版经历了27年<sup>②</sup>，分为梵、藏、满、汉四体合璧版和梵、藏、满、蒙、汉五体合璧版<sup>③</sup>两种。四体合璧版《同文》有乾隆十七年和乾隆三十二年（梵、藏、满、汉合璧）的两种，而五体合璧版《同文》（梵、藏、满、蒙、汉合璧）是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刻的乾隆三十九年版本。以往除蒙古文阿礼嘎礼以外的《同文》相关研究，如聂鸿音等学者的论文均以四体合璧版《同文》（即没有蒙古文阿礼嘎礼）作为底本进行研究，笔者以往相关成果和本文所指的《同文》则是包括梵文、蒙古文的五体合璧版。

根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收录情况，五体《同文》流传情况如下：单行本，收藏于中国民族图书馆，乾隆二十四年版（实际为二十四年刊刻，三十二年印刷），线装，共6册，24.5厘米×13厘米；合刊本1，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收藏于中国民族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乾隆三十九年刊行，经折装，25.9厘米×13.1厘米；合刊本2，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版，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线装，23厘米×13.5厘米。

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本是乾隆三十二年版，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所藏本是上海涵芬楼影印乾隆内府刻本字样的合刊本，共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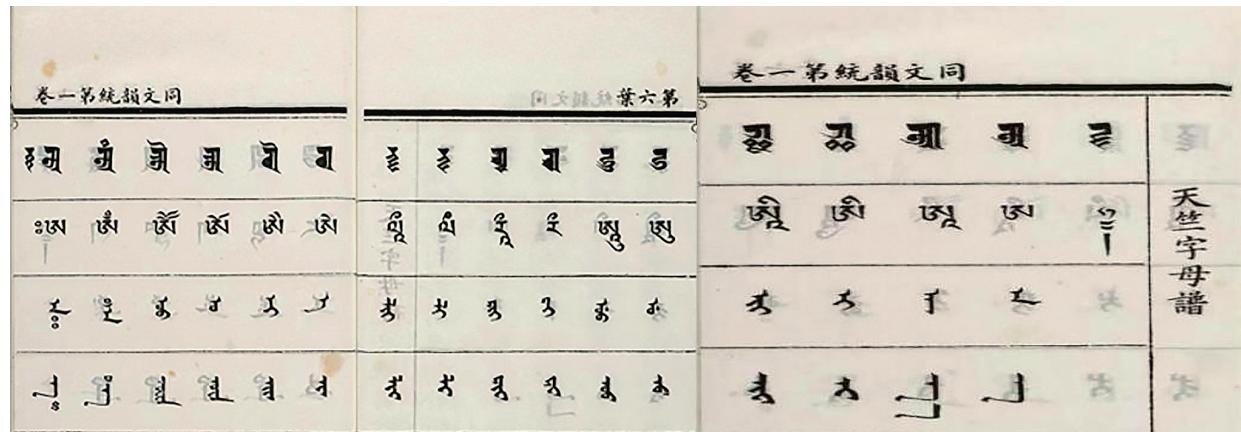
春花在其前揭《论三体及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的编纂和刊行》一文中对《同文》四体合璧与五体合璧版的流向和数量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乾隆皇帝曾三次向京城及直省各寺庙颁赐《大藏全咒》，《同文》也

<sup>①</sup> 王敌非《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满语研究》2011年第2期；王敌非《满译〈般若波罗蜜多咒〉中的阿礼嘎礼》，《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6期；前揭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清代藏文音读规范》，《语言研究》2015年第1期；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官话尖团音》，《语文研究》2016年第1期；施向东《〈同文韵统〉所见清初藏语概貌》，《民族语文》2018年第1期。

<sup>②</sup> 春花《论三体及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的编纂和刊行》，《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5期。

<sup>③</sup> 这里所指的四体与五体合璧包括《同文》卷一中“天竺字母谱”附有的梵文。

〔图一〕《同文》天竺字母谱之元音字型  
采自前揭《钦定同文韵统》第一卷，第6页



随之流布，其中四体合璧《同文》共40部，五体合璧《同文》共55部。由此可见五体合璧版的收藏不仅限于《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所记载的8处，其他40多部及四体合璧版的其余多部的流向需要进一步考察。

## 二 《同文》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字型来源与结构特征<sup>①</sup>

蒙古文阿礼嘎礼的产生早于满文阿礼嘎礼一百八十余年，由喀喇沁喇嘛阿尤什固始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编写而成。蒙古文阿礼嘎礼拼写方式萌芽于13—14世纪期间的回鹘式蒙古文佛教文献中，而其梵、藏文转写符号的补充和转写规则的完善由阿尤什固始完成。阿尤什固始编纂蒙古文阿礼嘎礼实际上是为了编修和整理蒙古文《甘珠尔》经（1602—1607）而做的准备，他与锡埒图固始一同奉敕阿拉坦汗旨意主持编修。目前还未曾发现阿拉坦汗方面刊刻或阿尤什固始署名的官方“蒙古文阿礼嘎礼”的版本。流传至今的使用蒙古文阿礼嘎礼的佛经中，阿尤什固始所译“qara kelen aman neretü sudur”（消除口孽经）<sup>②</sup>应为最早的一文。收藏于各个机构的蒙古文阿礼嘎礼读写法之类的书籍均为较晚期版本，如贡布扎布所著木刻板《元音与辅音》、佚名著布里亚特木刻板《梵文十六元音与三十四辅音》，前者为17—18世纪之间的，而后者为20世纪初的出版物。贡布扎布所著“元音与辅音”的蒙古文阿礼嘎礼与《同文》有差异，正月曾撰文作了详细阐述<sup>③</sup>。

根据目前相关收藏信息和研究成果来看，满文阿礼嘎礼初见于四体合璧《钦定同文韵统》〔图一〕（乾隆十七年，1752），后于乾隆三十二年以《御制阿礼嘎礼》名与《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

<sup>①</sup> 本文按照“文字”与“转写符号”概念的本质区别，有意将“字形”与“字型”区别使用，前者多用于字母形式，后者多用于阿礼嘎礼形式。

<sup>②</sup> 前揭《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第36页，00180条。

<sup>③</sup> 正月《关于贡布扎布的木刻版〈元音与辅音〉》，《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8年第6期。

于乾隆三十九年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合刊形式再次刊行。而康熙帝敕修的三体(梵文、藏文、蒙古文)合璧《御制阿礼嘎礼》应该是目前所见清代官方编修的最早的阿礼嘎礼版本,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乾隆时期刊刻的五体合璧《同文》中呈现的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是一套字体比较完整、规范程度较高的转写系统[图一]。从五体合璧《同文》的满文阿礼嘎礼可以看出其创制和编纂曾受到蒙古文及蒙古文阿礼嘎礼的影响。蒙古文和满文阿礼嘎礼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字型结构和特征上, 还体现在二者均有转写梵文、藏文佛教专有名词和术语的两套系统上。

[表一] 梵文、藏文与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字型对照表<sup>1</sup>

梵文罗马转写	a	ā	i	ī	u	ū	ṛ	ṝ	!	ī	e	ē	o	ō	am	ah
藏文	༄	༅	༅	༅	༅	༅	༅	༅	༅	༅	༅	༅	༅	༅	༅	༅
蒙古文阿礼嘎礼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ᠳ
满文阿礼嘎礼	ᡳ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ᡃ

从[表一]中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元音字型看, 其基础字型均源自蒙古文<sup>2</sup>, 可从蒙古文找到其原型。其中a与ā的字尾与蒙古文a的常见词末形式w/a不同, 采用了与蒙古文ŋe相同的形式, 如[图一]第四行右一、二字这样可以明确区分蒙古语词与梵、藏来源词, 满文阿礼嘎礼则不同, 见下述。除e、ē、o、ō、am、ah外的其余10个元音均按照蒙古文原有的书写规则书写, 如长元音的标记法采用了蒙古文的叠书相应短元音字母的方式。

e ē o ō am ah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在结构上表明了梵语元音的性质。从ē、ō的标音看, 二者均为长元音, 但是梵—藏传统文法则认为e、o原本为双元音ai、au, 而ē、ō为长双元音āi、āu<sup>3</sup>。蒙古文阿礼嘎礼 ᠠ ᠠ ᠠ/ ᠠ/ (e ē o ō)中c是蒙古文辅音字母w, 这里却用来标记元音e。e为c, ē则为c的叠书形式cc。o的形式cc如同蒙古文的հա/ huwa/ յա/ yuwa一样, 这里的c是两个元音中的介音, 这是蒙古文书写复合元音的一种正字规则与方法。为此蒙古文阿礼嘎礼cc/o的书写结构o+w+a实际上说明了它是双元音, 而cc形式说明其为长元音形式(w的叠书), 这两个文字形式表达了它们具有双元音和长元音的双重特点。

藏文传统文法中认为am ah是梵语a同附加符号m鼻音化符号anusvāra °与h(气音符号 Visarga °)相结合产生的特殊元音, 受此影响《同文》中也收录了16个元音及其对应的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16个元音符号, 其中末端两个便是aŋ与上述两个附加符号相结合的形式ŋŋ和ŋŋ, 如[图一]第四行左一、二字。

满文阿礼嘎礼的a、i、e、o、u元音符号沿用了原满文字母的相应形式。满文阿礼嘎礼的ā、ī、ō等长元音

1 本文中的蒙古文阿礼嘎礼与满文阿礼嘎礼字符, 采用word界面“插入”符号中MongolianBaiti条目中的字符, 这个字符与实际文献中的蒙古文阿礼嘎礼与满文阿礼嘎礼形式有一定的差异, 具体请参看《同文》相应图片中的阿礼嘎礼对应形式。藏文字符是Microsoft Himalaya字符, 本文一律采用拉丁音标代替梵文字符。

2 本文所指蒙古文或原蒙古文为回鹘式蒙古文, 其字母字形与现代蒙古文有诸多区别, 是蒙古文早期形式。蒙古文阿礼嘎礼的创制使用促进了回鹘式蒙古文的历史进程, 成为蒙古文进入近代成熟期的标志。

3 [日]辻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 东京: 岩波书店, 2010年, 第6页。

符号是其短元音符号的叠书形式，但是ā的独写形式为𠂇+特殊词尾，该特殊词尾形式来自蒙古文与满文a、e字母词末形式的木刻体𠂇，类似于蒙古文阿礼嘎礼a的词末形式，𠂇又是藏文𠂇型a的满文阿礼嘎礼形式，叠书后表示长元音。ē、ū的满文阿礼嘎礼形式为新创形式，为原满文e与i的叠加形式𠂇，从字型结构上体现了该梵语语音的双元音性质。ū为原满文u与原满文o词末形式的叠加即𠂇形式，切合满文长元音标记法。值得注意的是ē与i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形是有区别的，ē𠂇(e+i)字型中间的连接线比𠂇i的腰线(连接线)要长一截，如[图一]第三行左第五字(ē)和第三行右三字(i)。r、ř、l、ř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型与蒙古文阿礼嘎礼形式一致。满文阿礼嘎礼am、ah的形成方式与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相同，是梵文元音附加符号o∞加书于满文𠂇a的上下而成。

综上所述，蒙古文阿礼嘎礼元音基本字型主要来源于蒙古文字母，其中原来的辅音字母“r”被赋予标写梵、藏语来源词元音e的新任务。而am ah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采用了梵文符号+蒙古文字母形、蒙古文字母字形+梵文符号的混合形式。

满文阿礼嘎礼元音基本字型主要来源于满文字母，除了ā的词末形式和ē字形，其余长元音标记法均与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一致，ē的字型与其梵语相应元音的双元音性质相关，am、ah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型采用梵文符号+满文字母字形、满文字母字形+梵文符号的混合形式，与蒙古文一致。

以上内容是根据《同文》卷一“天竺字母谱”音韵十六字的字型与结构特征并结合梵—藏元音和蒙古文、满文元音字母及其读音作出的分析和阐释。从《同文》卷二“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十二谱”所罗列的天竺复合字(译咒之用)中，既可以得知天竺音韵16字与辅音字34字结合的复合字种类，又可得知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与辅音符号在实际复合字中的出现形式。这十二谱实际上可分为六种，即第一谱的元音16字与辅音34字相结合的复合字、第二谱的辅音33字(𠂇不用)下加半元音y、r、l、v四字结合的复合字、第三至第六谱二个辅音字形叠书的复合字、第七至第九谱与附加符号o∞(o∞)z(ε)u等结合的复合字、第十谱双字及多字叠书的26个复合字、第十一谱和第十二谱的音韵5字(a、i、u、e、o)与辅音34字配合再与哈兰达符号所结合的复合字等。其中与音韵字相关的有第一谱、第十谱和第十二谱。这四个谱中出现的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符号有以下几个特点：1)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r、ř、l、ř与辅音符号相结合时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如𠂇、𠂇、𠂇、𠂇(蒙古文阿礼嘎礼)𠂇、𠂇、𠂇、𠂇(满文阿礼嘎礼)，关于这种写法在《读咒法》《元音与辅音》等其他文献中均有解释<sup>1</sup>；2)第十谱kō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形式为𠂇(kuu)，正确应为𠂇形式，这里显然与满文阿礼嘎礼混淆；复合字bhrūm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形式为o∞(bhrūm)，正确应为

<sup>1</sup> 按常规理解，从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𠂇、𠂇、𠂇、𠂇与𠂇、𠂇、𠂇、𠂇形式看不出其中的r、ř、l、ř标记的是梵文元音r、ř、l、ř还是辅音l。但是按照蒙古文阿礼嘎礼的书写规则“ka与ra, la分别叠书再与元音a、i、u、e、o相结合时应写为𠂇、𠂇、𠂇、𠂇、𠂇，而与元音r、ř、l、ř结合时应写为𠂇、𠂇、𠂇、𠂇”来看，可以确定前一种形式中的r、l为辅音，后一种为元音。关于蒙古文阿礼嘎礼此番书写规则，请参看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所藏，上海涵芬楼影印乾隆内府刻本《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合刊本中的御制满、蒙、藏合璧《读咒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也有此版，前揭春花《论三体及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的编纂和刊行》)。显然《同文》的蒙古文阿礼嘎礼这一形式与原规则不符，而满文阿礼嘎礼形式符合原规则。

⑩形式，这里多了一个词尾形式；3)第十一、十二谱出现蒙古文阿礼嘎礼u、o的字型与卷一不一致的情况，如ung写作ㄩㄤ，ong写作ㄩㄶ，它们的正确形式应该为ㄩㄤ和ㄩㄶ。《同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字型则始终保持一致。

### 三 《同文》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来源与结构特征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蒙古文与满文阿礼嘎礼分别有两个系统即梵文系统和藏文系统，我们将分开说明这两种系统的阿礼嘎礼辅音字型之来源与结构特点。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辅音符号比起元音符号数量多，字型结构复杂，我们首先用表格说明梵文辅音字母的蒙古文与满文阿礼嘎礼对应情况〔表二：1-4〕，再作进一步阐释。

[表二] 梵文、藏文与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对照表

〔表二:1〕喉音组与舌尖音组<sup>(1)</sup>

[表二:2] 反舌音组与齿音组

[表二:3] 唇音组与半母音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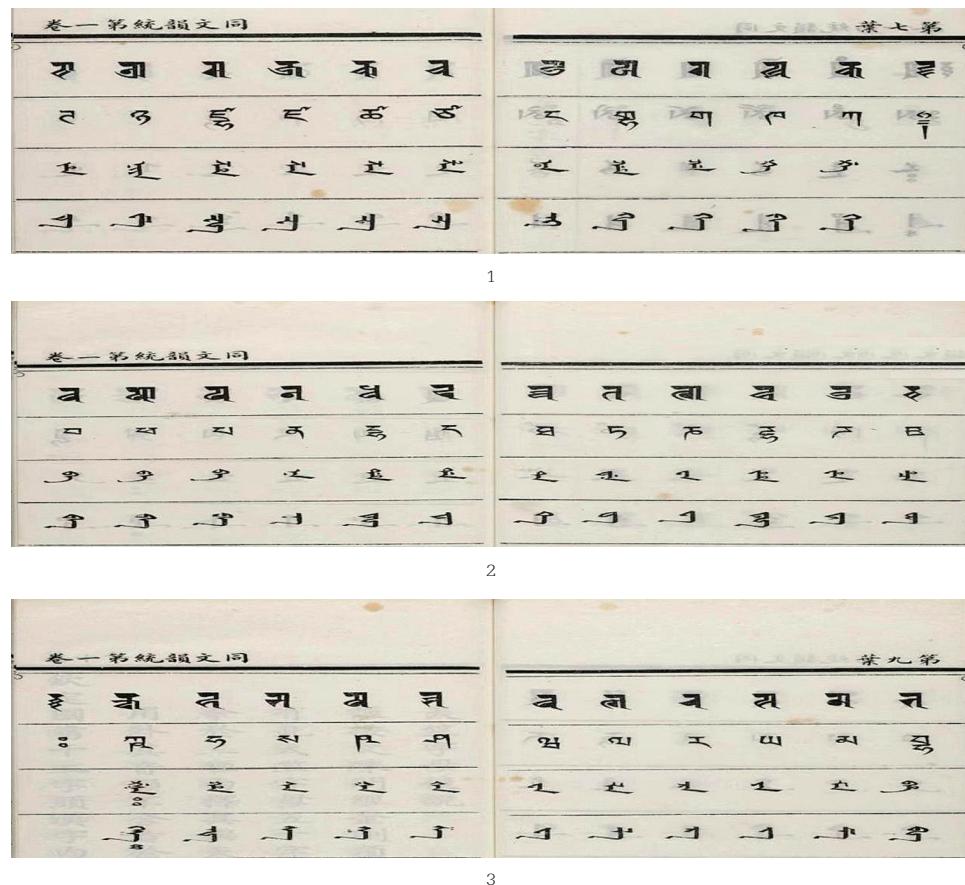
〔表二:4〕 擦音、气音组<sup>(2)</sup>

梵文罗马转写	śa	ṣa	sa	ha	kṣa
藏文	ས	ସ	ସ	ହ	କସ
蒙古文阿礼嘎礼	ᠥ	ᠧ	ᠥ	ᠷ	ᠺ
满文阿礼嘎礼	ᡶ	ᡷ	ᡶ	ᡥ	ᡴᡷ

（1）笔者依据学界常用的藏文字母转写法用舌尖罗马字转写了这组辅音，这与《同文》中的汉字对音（精组一等字匣、擦、杂）也是吻合的。

② 本文各表格中采用的word版蒙古文阿礼嘎礼与满文阿礼嘎礼符号不全，部分字型为拼接形式，具体形式请参照〔图一〕、〔图二〕的对应字型。

[图二]《同文》天竺字母谱之辅音字型  
采自前揭《钦定同文韵统》第1卷,第7—9页



形的蒙古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喉音组ka、ga、nga，反舌音组da，齿音组ta、tha、da、na，唇音组pha、ba、ma，半母音组ya、ra、la、va，擦音气音组sa、sa，共17个符号，这17个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均可从原蒙古文字母中找到原型。

喉音组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以蒙古文 $\text{g}$ 为基本形式，反舌音组的da的阿礼嘎礼字型沿用了蒙古文木刻板d字形 $\text{d}$ ，见[图二：2]第四行右二、三字。齿音组的基本字型为蒙古文 $\text{t}$ 字母形式，其中ta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形式由蒙古文d字母手写变体 $\text{d}$ 而来，见[图二：2]第四行右第五字唇音组的基本字型为蒙古文 $\text{b}$ 字母形式，蒙古文字母 $\text{p}$ 是在 $\text{b}$ 字母字头上加一个“点”而成。蒙古语pa辅音早在14世纪曾被蒙古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尔所发现，并创制出字母 $\text{p}$ 收录于《心鉴》。由于该语音在蒙古语母语音系中并不常用，所以只有在阐述蒙古文原理的理论性书籍《心鉴》中出现<sup>①</sup>，而实际文献中并没有使用它的痕迹。蒙古文阿礼嘎礼中沿用该字型转写梵文pha字母，而梵文的pa则用 $\text{p}$ 形式转写，见[图二：2]第四行

从上列各表看蒙古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来源有：  
1)标记梵语和蒙古语相同辅音时，沿用了原蒙古文字母形式；2)标记梵语和蒙古语相近辅音时，对原蒙古文相近字母的字形笔画稍作改变而得出新的字型；3)对蒙古语中没有而梵语特有的辅音字型参考相应藏文、梵文辅音字母字形笔画所做的创制；4)以复合方式创制新的字型。具体如下(为了节省篇幅，除特殊说明之外以下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形式由其相应的转写符号代替)：

沿用原蒙古文字母字

<sup>①</sup> (清)丹金达格巴《虚空宝》，《蒙古语言学史文献汇编》第一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5年。《虚空宝》是元代蒙古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尔所著《心鉴》的注解文章，而《心鉴》是早期蒙古文语法与正字法启蒙书籍。丹氏在其《虚空宝》中明确说明了搠氏蒙古文字母表中有 $\text{p}$ 字母，该字母代表的蒙古语辅音实际上对应梵、藏文的双唇清塞音ph辅音，故本文采取的蒙古文阿礼嘎礼 $\text{p}$ 的罗马字转写与其梵文一致。

右第二字。擦音组的基本字型为蒙古文“s”、“š”字母形式，而nga、na、ma等鼻音和半母音组的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与蒙古文相应字形一致。

蒙古文原字母字形上改变其笔画结构所得出的新创字型：喉音组kha、唇音组pa、擦音组sa共3个符号属于这一类。喉音组清送气音kha无相对应的蒙古语辅音，因此把蒙古文字母“č”的字头交叉斜线笔画变成直线笔画作为该辅音阿礼嘎礼形式“č”，见[图二：1]第四行右第二字。唇音组的pa字型来自蒙古文b字形，将b字头笔画由封闭式“b”改变为开口式“p”而来，见[图二：2]第四行右第三字。“sa”或“š”形式来自蒙古文ša“š”字形双点位置的改变。

由藏文、梵文相应辅音字母字形而来的新创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舌尖音组tsa、tsha、dza、ňa，反舌音组ṭa、ṭha、ňa，气音ha，共8个字型。蒙古语本没有这些辅音，因此也没有相应的辅音字母。因此舌尖音组tsa、tsha、dza以“j”、“č”作为基本字形的前提下，参照藏文字母tsa、tsha、dza与ca、cha、ja字母字形笔画之间的联系创制使用了“dsartig”（藏文为tsa rtig）附加符号，与“j”字形相结合构成新字型，分别标记ts、tsh、dz、dzh，见[图二：1]第四行左第六、五、四、三字。用源自藏文字母“đ”的“đ”形式作为蒙古文阿礼嘎礼“đ”ňa的字型，见[图二：1]第四行左第二字。参考藏文齿音字母与反舌音字母字形笔画之间的联系，用源自藏文齿音字母“đ”“đ”字形而来的“đ”“đ”作为ṭa、ṭha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见[图二：1]第四行左第一字、[图二：2]第四行右第一、二、三字与[图二：2]第二行第五、六、七、八的藏文形式对照。在原蒙古文字母没有表示送气音符号的情况下参照藏文字母“đ”ha创制“đ”“đ”字型，见[图二：3]第四行左第二字及其对应的藏文字形。蒙古文没有与ňa对应的字母形式，因此参照梵文字母na的字形创制了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đ”，见[图二：2]第一行左第四梵文字母na。

复合方式创制的新字型：梵语gha、dzha、đha、dha、bha、kṣa等是浊送气辅音和复辅音，蒙古语没有这些语音，自然也没有相对应的字母，因此这些辅音的阿礼嘎礼字型由相应浊辅音字母+送气音符号组成，即“đ”“đ”、“đ”“đ”、“đ”“đ”、“đ”“đ”。

满文阿礼嘎礼辅音符号的字型来源有四种，具体为：1)对于满语和梵语相同或相近的辅音采取了沿用原满文字形的方法；2)对满语没有而梵语特有的辅音采取了沿用满文特定字母形式的方式；3)创制新的字型；4)采用复合方式创制而来的新字型。

沿用原满文字形的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有：喉音组ga，齿音组tha、da、na唇音组pha、ba、ma，半元音组ya、ra、la、va，擦音、气音组ša、sa、ha，共计14个字型的来源属于这一类。这些辅音与梵语辅音基本相同或相近，其字型来自原满文字母字形，王敌非曾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满—梵辅音间的异同（前揭王敌非《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再此不做赘述。

众所周知，满文源自蒙古文，满语和蒙古语又同属阿尔泰语系，因此梵语与满语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大部分又和蒙古语相同或相近。但是满文初创时满语处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期阶段，因此满文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与蒙古书面语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在时间上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蒙古文所反映的是中世纪蒙古语。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在字型特征方面也反映出蒙古文与满文书面语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例

如，中世纪蒙古语喉辅音和舌根辅音中只有q、χ和k、g两组音，无小舌清音x，所以蒙古文字母也没有与之相应的成分，而满文和满文阿礼嘎礼却有与x辅音相应形式。

沿用满文特定字母字形的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有：喉音组ka、kha，舌尖音组tsha、dza，反舌音组tha、ta，共计6个字型属于这一类。kha字型，来自满文特定字母k，其对应的蒙古文字母是舌根清辅音k字母，与其相同字型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却对应梵语浊不送气g辅音。tsha、dza字型来自满文特定字母的字形，tha、ta的字型来自满文特定字母ščyžjy字形。

新创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有：鼻音nga、ña、ña与齿音组ta，唇音组pa，擦音组sa，共计6个字型属于新创字型。梵语nga辅音在蒙古语和满语中均不出现在词首，其满文阿礼嘎礼字型来自ña字前加圆圈，而ña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型niya是其满式读音的标记形式，标记方法上属于新创，其蒙古文阿礼嘎礼对应形式却是新造字型t。满文阿礼嘎礼ña的字型与蒙古文阿礼嘎礼一致，用来自梵文na的辅音字母形式。满文阿礼嘎礼字型ta以满文d辅音字母词形式中加一个点而成，pa字型与蒙古文阿礼嘎礼相同，为š形式。ña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型t是原满文舌尖后清擦音字母šč的变体，而šč的原型源自蒙古文阿礼嘎礼t字型。

复合方式创制的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由满文原有字母字形结合新创符号、满文特定字母字形结合新创符号而成，包括喉音组gha，舌尖音组tsa、dzha，反舌音组da、dha，齿音组dha和唇音组bha，以及擦音组ksa，共8个。

梵语浊送气音gha、dzha、ha、dha、bha五个音，在满语和蒙古语语音系统中均无，因此也没有相应的辅音字母，为此其满文、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结构分别由原有字母或特定字母字形加表示送气符号的圆圈而成：tsa字型由满文特定字母t+圆圈而成，ña由原满文d字母词中变体加圆圈构成，tsha则由特定字母字形t加圆圈构成，而ksa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型显然以满文原有字母k和新创字型s相加而成，与蒙古文阿礼嘎礼的构字方式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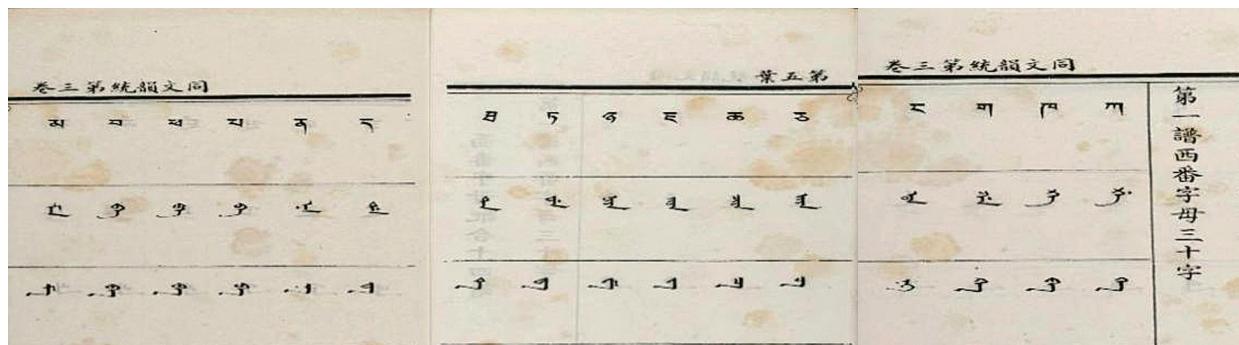
《同文》卷二“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十二谱”中罗列出天竺复合字(译咒之用)1212个(rra重复出现了三次，复合字实际数量为1210字)，其中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均符合《同文》卷一的字型特点，没有出现错讹现象。

藏文五个元音与梵文a、i、u、e、o基本相同，因此藏文系统的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字型也与其梵文形式一致，在这里不予重复。藏语大部分辅音与梵语辅音相同，相同的辅音及其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形式如同上述，而藏语特有但梵语没有的辅音有6个，它们的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字型如下：

[表三] 藏语独有辅音及其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字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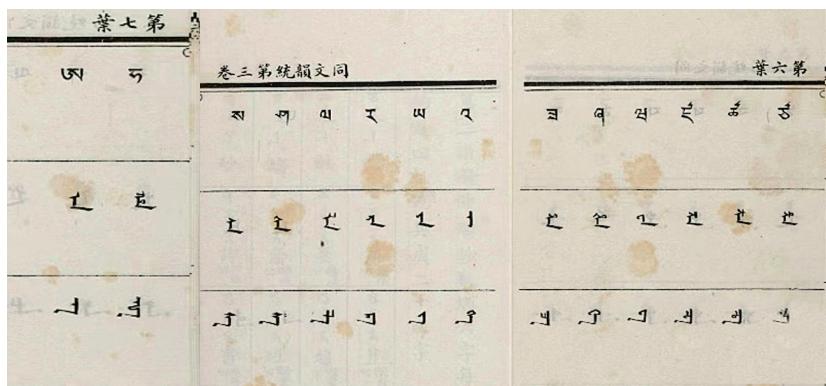
文种	ca	cha	ja	zha	za	ha
藏文	西藏	西藏	西藏	西藏	西藏	西藏
蒙古文阿礼嘎礼						
满文阿礼嘎礼						

[图三]《同文》西番字母三十字与阿礼嘎礼字型



1

[表三]中前3个辅音与蒙古语相应辅音语音特征相近，其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同于蒙古文字母字形。回鹘式蒙古文阶段的蒙古文j辅音词中形式与č辅音字母形式一样，同为𠁧，但是蒙古文阿礼嘎礼体系中将其区分，分别为𠁧和𠁧č字型[图三：1]，从此蒙古文系统中j和č才有了各自的形式，并逐渐得以规范。后3个藏文辅音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分别来自藏文𠁧、𠁧、𠁧的字形笔画，属于新创，如[图三：2]第三行右第五、六、七及其对应的藏文形式。



2

[表三]是藏语独有而梵语没有的辅音及其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字型对应情况，这足以说明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除转写梵文系统外另有藏文系统。所谓的“阿礼嘎礼”不只单指转写符号体系，还包括其书写规则，尤其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在实际使用中曾转写有大量的藏传佛教专有名词、术语等，它们体现了这两种阿礼嘎礼转写藏文时所遵循的规则。据此，本人认为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有梵、藏两种系统。

蒙古文阿礼嘎礼和满文阿礼嘎礼字型来源和结构特征比较明显，二者既有延续性又有差异性。二者的延续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文来自蒙古文，满文字母（包括特定字母）基本上可从蒙古文或蒙古文阿礼嘎礼找到原型。1632年奉清太宗皇太极之命对老满文进行改进时，加书了“点”和“圈”以区分不同语音，又从蒙古文阿礼嘎礼（1587年创制）借用和借鉴了部分字型和构字方式；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二

者的用途和使用对象方面。如前所述，这两套阿礼嘎礼都是为了蒙、满佛教典籍翻译中专门拼写那些梵、藏语专有名词、佛教用语和咒语而创制，因此其用途和对象是一致的。此外，两种阿礼嘎礼字型和结构又各自有其显著的特点，如蒙古文阿礼嘎礼创制使用了较多新创字型（共15个，包括元音e、o的标记方式），而满文阿礼嘎礼新创字型只有7个（不包括满文特定字母），这里没有包括 ē 和与圈点结合而来的字型。因此，在实际文献中满文阿礼嘎礼所记载的梵、藏语词和满语词在形式上多有混淆，而蒙古文佛教文献中的梵、藏语词则一目了然，易于辨认并复原其藏文形式。

蒙古文、满文佛教典籍中的大部分梵语来源词是通过藏文途径进入蒙古语和满语的。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对于“阿礼嘎礼”概念的说明，它既包括符号（字型）体系，也包括书写规则。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书写梵、藏语专有名词、佛教名词术语、人名地名、咒语时，遵循的原则就是对这些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藏文书面形式进行转写。《同文》卷三“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中藏文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和后加字及重后加字的说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书写原则不仅体现在五体合璧《大藏全咒》等御制、钦定的大型佛教文献，还贯穿于其他官方刊刻的单文种满、蒙古文佛教典籍和民间传抄本，可见清朝推行的“同文治之”政策对于我国各民族文字的发展和规范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附记：感谢评审专家对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指正。本文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春花、李文君等学者在资料搜集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一并感谢。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责任编辑：何芳）